

第 25 辑

湖南文史 资料

周谷城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编 辑 说 明

一、湖南各民主党派的地下斗争和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各地的地方武装斗争，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这方面的史料我们没有集中介绍过，因此编辑一本民主党派斗争和地方武装斗争史料的专辑是很有必要的。

二、本辑选用了18篇史料。有关民主党派斗争的4篇，反映地方武装斗争的12篇，其他2篇。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不可能将所有这方面史料都选入，所选入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篇目。

三、本辑在选编过程中，有关领导和人士在组稿、核实史料等方面给予了积极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四、本辑内容难免还存在一些差错，希望读者予以补充订正。

湖南文史资料

第25辑

目 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前在湖南的活动

.....钱去非 龚业隆 周荣光(1)

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

.....民盟湖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21)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

.....钱去非 唐耀晖(39)

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各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民建湖南省委
湖南省工商联文史办公室(54)

解放湘南.....刘亚球(62)

从抗日到解放战争的湘南游击斗争略忆.....刘国安(70)

湘中总队五支队一团队二三事.....衡山县政协(91)

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的

建立与斗争.....谷子元 何大群(95)

建立湘南游击司令部直属六中队(建新部队).....蔡新民(124)

湘南人民行动支队始末记.....罗立德(136)

湘中一支队第一大队的建立.....毛际寿(148)

湘中地下武装斗争的一个侧面·····	张生力(151)
回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	湛鸿章(182)
湘东纵队回忆·····	邹继衍 谭源育(189)
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的始末·····	胡耀福 陈新明(203)
记江南地下军第四军第十师和师长焦达悌 ·····	刘逸秋(218)

补充·订正·质疑

对屈子健的《湖南优级师范概述》的订正·····	彭肇藩(229)
对《湖南民盟地下斗争概况》一文的一点补充 订正·····	刘文炳(23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建国前在湖南的活动

钱去非 龚业隆 周荣光*

一、民革创建前后的历史背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1948年1月1日成立的。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众叛亲离，民怨沸腾。在军事上，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山东的军队受到了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这时白崇禧盘踞华中地区，蒋介石利用程潜与桂系的宿嫌，派程潜回湘主政，藉以钳制白崇禧，妄想保住西南，负隅顽抗。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湖南，已百业凋零、民穷财尽。“金元券”、“银元券”相继成为废纸，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希望休养生息之心，无时或已。程潜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于1948年7月回湘主政的。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湘军总司令，兼任过省长，竞选过副总统，同蒋介石、桂系都有矛盾，在湖南省影响大、威望高，湖南不少人把他誉为“家长”。因此，他回湘主政受到各界的欢迎，希望他能消除战祸，争取和平的到来。跟程潜回湘的有，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等一批湘籍黄埔军校学生，均被蒋介石视为亲信，这是蒋介石为监视程潜而在人事安排上采取的措施。

*钱去非建国前系湖南民革组成部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建人。龚业隆、周荣光建国前系湖南民革成员。

白崇禧对程潜回湘主政很不放心，他在武汉主持“华中长官公署”，不时对程潜施加压力，可谓“虎视眈眈，其欲逐逐”。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明令取消湖南和平促进会，不准喊和平，也不准喊自救，直到威逼程潜交出政权，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程潜当时既要应付蒋的亲信，又要防范白崇禧，处境十分复杂和艰难。

湖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时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要和平的斗争风起云涌。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相继成立了地下工委，开展了斗争，掀起了和平、民主、自救的运动。这个运动尽管遭到了桂系势力的镇压，但和平自救的声势，如同波浪一样，一圈一圈地展开、扩大，终于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向旧政权冲击。

二、民革地下革命工作的开展

1948年在湖南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民主派有“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两个组织。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民革、民联与民促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湖南民革、民联的地下革命活动开始于1948年春，由于斗争环境复杂艰险，彼此一般没有横的联系，初期也无统一组织。当时可分为三条战线。但不管哪条战线都是来自民革、民联中央的直接指示，分别与中共湖南省工委、长沙市工委党组织挂上了钩，所以开展的各项地下革命工作，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三条线为：

（一）以方鼎英为首的一条战线。方曾任黄埔军校教育

长，与民革主席李济深交往颇深。在南京政府担任要职的人不少是方的朋友、旧属或学生，因此在策反方面，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方鼎英派梁觉去港与李济深联系，李要方在湖南就近开展民革地下工作，重点摆在策反上。这年夏天，方的亲戚中共党员吴成芳专程由沪来长沙看望他。方把李济深对他的指示告诉了吴。吴表示支持，并说：“首先要团结唐生智，推动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以迎接解放。”方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经吴成芳介绍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组织接上了头。当时参加这条战线工作的有：原《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宋希濂的胞弟宋仁楚、原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原省参议员陈云章（陈未加入民革）、原财政部湖南区货物税局督导段荫南、主任秘书钟山以及马子谷、伍光宗、王果元、邹务山、方发祥等人。

（二）以程一中、戴朝震、唐伯球、凌兆尧、许松圃、周翊襄、黄栋、宋英仲为主的一条线。

1948年春，程一中（民联中央组织部长）的女婿、民联成员、中共地下党员黄栋，奉上海中共党组织和民联中央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之命来湖南开展工作，根据中共党组织意见，出任即将就职的“湘粤赣剿共司令部”副司令宋英仲的秘书，以便开展军事策反。后因宋英仲与司令叶肇有宿嫌未就职。黄栋乃在郴县南江中学以教书为掩护来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底接到中共湖南省工委调令来长沙，那时方鼎英在新化，黄栋受中共省工委之命去沪将程一中邀回长沙，于是民革湖南省工作委员会于1949年3月在长沙秘密成立，由程一中、许松圃等人为主，黄栋负责日常工作。

（三）以邓飞黄、杨世骥、钱去非、唐耀晖为主，奉民联中央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之命于1948年冬在长沙组建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湖南地下组织。民联的革命活动，

另有钱去非、唐耀晖二人的专题叙述，这里就从略了。

三、敦促程潜起义

解放战争迅猛地发展。早在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看望程潜的一席谈话，以及程潜的一生经历，对程潜的率部起义具有决定性影响。此时白崇禧掌管华中军政大权，不时对程潜施加压力，直至当面要程交出军政大权；蒋介石对程潜虽然鞭长莫及，但有他的亲信黄杰等在程潜左右监视他的行动；加上程潜又被中共宣布为战犯，其心中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湖南人民对他的信赖，亲朋依旧对他的劝说，加上各方面对他的影响，成了程潜率部起义的重要因素，而民革、民联地下组织的活动就是这个重要因素中的一部分。

1948年8月，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周礼委托余志宏通过何之光把程星龄从台湾请回长沙，开始做程潜的工作。程星龄和程潜是同族兄弟，易于接近。程星龄与余志宏早就相识，私交颇笃。这样程星龄通过余志宏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建立了直接联系。余志宏也由程星龄的安排与程潜见了面，余志宏对程潜阐述了中共政策，消除了程潜对“战犯”一词的顾虑。与此同时，程潜的重要僚属省政府顾问方叔章、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肖作霖等力劝程潜走和平道路。程潜表示：“关于战和，应以人民之意愿为是。”1949年6月，程星龄受程潜之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送交中共中央，表示决心脱离南京政府，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八条，走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毛泽东主席立即复电表示嘉勉，并说：“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

参加和平起义策反工作的还有刘公武、马子谷、刘岳厚、苏民、苏本诚、苏本善、曹伯闻、唐伯球等人。他们多是程潜

的僚属、同事、学生，能接近程潜，程潜也信任他们。所以他们的工作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影响是比较大的。

四、军事策反 搜集情报

苏民此时是湖南省设计委员会委员，与桂系关系较深，白崇禧要他出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但他看清了形势，决定投奔革命，婉言谢绝了白的任命。他在民革许松圃、戴朝震的授意下，利用和桂系十一兵团司令官张淦的关系，得知白崇禧将来长沙，以岳麓山为制高点，以岳州、衡阳、宝庆为军事要地，决战在黄沙河一带，并得知张淦兵团有20万兵力。随即将此情况面告许松圃，转报中共湖南省工委。

1949年5月，苏民受程潜命去桂林探察桂系动态。苏民到桂林后，拜见了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人，交谈甚久。李宗仁表示，他已向南京政府提出要赋予总统实权，否则出洋不干了，并气愤地说：“我要黄珍吾当南京警察局长都不同意，这成什么代总统？”苏民乘机暗示，程颂公与他们（指蒋介石）也有矛盾，并问李宗仁对湖南的看法。李宗仁说：

“我们对颂公是尊重的，元老嘛，以颂公的意见为意见。”李品仙插话说：“程颂公受左右迷惑，既不征兵，又不征粮，这仗怎么打下去？不明明是迎接共军嘛！”白崇禧接着说：“程颂公到底在湖南怎么搞，我和刘建绪讲要程颂公去广州当考试院长，究竟他怎么搞？”苏民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白崇禧说：“黄杰、刘斐、丘昌渭这些人怎么样？”苏民说：“论他们的资历都可以当省主席，但他们的威望不如颂公，湖南人把颂公当家长看，如果硬要他离开湖南，他的军队怕不会同意。”白崇禧似有责难地说：“吓！你莫专门讲代表的话”。苏民说：“不是讲代表的话，我讲的只是那边的实际情况。”白崇禧说：“那你莫管了，你只委婉向颂公讲我们的意见，要他去

广州，同时，唐孟潇（唐生智）老是在那里不好，也要离开湖南。唐孟潇已有信给李品仙，唐想带兵。我们没有兵给他带，我把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让给他。”

苏民回长沙后，即把上述情况向程潜、唐生智作了汇报。

宋英仲，民革地下成员，当时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为了掩护民革市工委领导人程一中的安全和便于联系工作，邀程一中住在宋家。警备司令部的情报由宋密告程一中转中共地下党余志宏、刘晴波、梁君大、周季平等。时间长了，国民党地方当局似有发觉，宋英仲家（住白沙井）遭到搜查，收音机被破坏，写字台抽屉被翻乱，幸早有防范，未查出破绽。

沈坚，民革地下成员，与白崇禧部驻市郊开福寺军火库的守护连长翁某有私交，利用这一关系策动起义。后翁虽被强令撤退，但行至株洲渌江桥附近终于起义，并保全了存放在开福寺的全部军火，抗拒了白崇禧炸毁军火库的命令，使人民避免了一场灾难，充实了解放军的枪枝弹药。

宋仁楚，民革地下成员，是宋希濂的胞弟。方鼎英利用这一关系和宋商定，约会宋希濂总部常德办事处副主任董仲筈（宋希濂的亲信，黄埔四期学生），恰逢宋希濂父病故辰溪，董去辰溪办理丧事，约谈未能实现。1949年3月，宋仁楚受方鼎英之命去湖北宜昌会晤宋希濂，试探策反起义，宋希濂表示：“当前正在进行和谈，可以瞧瞧。”后来，据闻宋希濂应蒋介石电召去奉化，联系也就中断。

苏本诚、苏本善是同胞兄弟，民革地下成员。当时苏本诚任华中长官公署陆空联络组中校组长，掌管国民党华中地区空军作战联络事宜。他以这一公开身份，将空中作战情报向事先商定好的中共党员周竹安密告，解放军因而得以防范，在军事上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18日至6月20日，湘赣两省连降暴雨，洪水猛涨。6月27日至7月2日赣江水位距东岸堤坊仅半公尺。这时，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分驻丰城、樟树、永泰、新淦、临川、龙骨渡、崇仁等地，共7个军，人数约30万。上述地段居民约200万人。白崇禧企图趁水涨炸堤，用水淹的办法消灭解放军。白便约见苏本诚，令他与衡阳一个姓罗的司令绝对秘密地联系，执行命令炸堤，并指定轰炸目标为泉港街之樟树西北55公里处、阳树之永泰西北5公里处、石口之新淦西北5公里处。苏本诚接受命令后即把这一重大情况送中共党员周竹安，并与其胞兄商定，用拖延时间的办法，阻挠炸堤命令之执行。如事发兄弟二人牺牲无疑，嘱先将家属作善后安排，并告知中共方面给予照顾。另一方面与衡阳联络，佯称此一任务必须调用三架B—25蚊式飞机，否则不起作用，请罗面陈白长官向空军总部调机。7月3日，B—25蚊式飞机调抵衡阳，白崇禧电令苏本诚飞衡，并于7月4日上午派专机来长接苏本诚去衡阳。苏本诚婉言向罗司令说：“炸堤对共军死亡性不大，而数百万老百姓则惨矣！”罗为之震动，沉默未语。次晨派飞机侦察炸堤目标，得悉赣江水位回退，乃转报白崇禧谓水位已退，执行这一轰炸任务已失去作用。因之这一狠毒罪恶计划未能实现。

五、邀请唐生智“出山”

唐生智是湖南军政界的耆宿，他的旧部遍及全国，湖南尤多，是左右湖南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他此时失意隐居故乡东安。1949年初，民革地下工作人员策动省参议会发动了反“三征”运动，反映强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促使了湖南要求和平的空气高涨。但黄杰、刘嘉树等人极为不满，依仗白崇禧的势力，威逼程潜表态不同意反“三征”行动。程潜大有孤军作

战、处境艰难之苦。为了争取和稳定程潜，民革地下工委派许松圃、唐伯球等人去东安，邀请唐生智来长沙。在此之前，黄栋受中共上海地下党和民联中央之命由上海回湖南工作，曾携郭春涛、程一中亲笔信去东安见过唐生智。后来周翊襄、陈云章、席楚霖等也曾去东安邀请唐生智来长沙。周翊襄曾任唐生智的秘书，关系更深，他先后三次去东安，唐表示：程潜无实力，他本人光杆一个，到长沙作用不大，最后经商讨，提议由唐的旧部刘兴担任衡阳警备司令，收编一些部队，目的在于自卫和截住白崇禧的后路，唐表示可行。并说：如颂公同意，他愿到长沙，但定要说明，他本人无此要求，而是唐伯球的意见。程潜接受了这一意见，即电邀唐生智、刘兴来长沙，共商国事，随即发表了刘兴任衡阳警备司令。但蒋伏生（原衡阳警备司令）抗命不从，又改刘兴为永宝警备司令。1949年4月，唐生智在周翊襄、陈云章的迎接下到长沙，受到了程潜和省城人民的欢迎。唐生智发表了讲话，呼吁湖南人民团结自救、争取和平，因而大大推进了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为程潜撑了腰壮了胆，给了黄杰、刘嘉树等反和平势力以打击。

唐生智到长沙后，即组“湖南和平促进会”。唐生智任主任委员，仇鳌、陈渠珍副之，刘公武任总干事，这样就团结了湖南中上层民主进步人士，大大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斗志，把和平自救运动推进了一步。

六、湖南省参议会

湖南省参议会议员，不少是国民党中上层的失意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其中有倾向革命的，也有顽固反共的。参议员的名额向例以全省中、南、西三路进行分配，因之影响力遍及全省。1948年12月，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与程潜政见不合，辞职去上海。赵是顽固派，他的去职削弱了顽固势力。这时唐伯

球、席楚霖得程潜的支持，当选为正、副议长，杨任严由席楚霖推荐任命为秘书长，凌兆尧被选为参议员，大大增加了进步力量。

从湖南酝酿和平运动开始，唐伯球即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刘润世、刘禄铨等取得联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议长地位团结参议会的进步力量，与程潜密切配合，对湖南和平解放有一定贡献。

1949年元旦，湖南省参议会通电呼吁和平，提出取消“动员戡乱”一切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接受中共和平条件等主张；同时推动成立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大团结”、“实行自卫自保”等口号，欢迎唐生智晋省与程潜合作，共策和运大计。从此，凡属有关和运的部署及措施，不便由省政府公开出面的，由唐伯球、席楚霖通过省参议会作出决议，建议省政府执行，或发出强烈呼吁与反动政府对抗，如停止征兵征粮，反对以田赋抵借券搜刮人民粮食，以金元券收购人民金银；查封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不准动用转移，通过省银行发行辅币券，自铸银元，以抵制金元券在湘省流通。唐生智来长沙后，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改组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公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省参议会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大造和平自救声势。周翊襄在欢迎会上大声疾呼：“湖南是湖南人民的湖南，孟公（即唐生智）讲的多么亲切感人。湖南人民决心和平自救，全力以赴，坚决反对战祸的摧残。为了和平，头可断、血可流，和平自救不可丢。我们要冷静头脑，认清大局，明辨是非，主持正义，奋勇向前，湖南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镇压和平自救运动，解散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威胁程潜，下令禁止一切和运活动，一时杀气腾腾，长沙城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少工作由公开转入地

下，但和平自救的声势有增无已。为了安定人心，继续战斗，省参议会邀集省市各团体举行座谈会，敦请陈明仁将军讲话。陈明仁在会上说：“长沙各界父老可以放心，保证长沙城听不到枪声。”寥寥数语，人心得以稍安，和平自救的信心更趋坚定。

在省自救会被迫解散表面上停止活动后，代之而起的是湖南救灾委员会，呼吁为滨湖大水灾筹款，提出不能再供应驻军口粮，要求客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借以反对白崇禧的战争叫嚣。此时白又施出调虎离山计，以李宗仁名义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省参议会领导群众团体分电李宗仁挽留，李被迫收回成命，白计未成，视唐伯球为眼中钉，曾率武装至校场坪唐家，迫令唐即日随程潜离长去邵，之后，白在衡阳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遗憾的是没有把唐伯球这帮政治掮客杀掉，程潜受了他们的蒙蔽。”

在和运活动期间，唐伯球与程潜过从甚密，经常深夜去省政府与程星龄、唐星、邓介松、邓飞黄、刘公武等密商，唐生智在省时也无日不有联系，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共商对策，在当时特务严密监视的恶劣环境中，风险是很大的。

七、清弭内部歧见

事情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民革湖南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度发生过分歧意见。其一是：许松圃提出吸收当时省政府秘书长杨绩荪、民政厅长田良骥两人加入民革，并参加工委领导班子。程一中、黄栋不同意，认为杨、田二人系桂系人物，必须慎重，作为联络对象是可以的。许松圃则认为杨、田思想倾向进步，坚持己见，以致程一中和许松圃发生矛盾。程打算另组“民革南下工作委员会”相对峙。后经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派员调解，黄栋也从中斡旋，始告平息。

其二是，周颢襄主编的《舆论导报》两次被省政府秘书长

杨绩荪强令停刊，周弼襄因此迁怒程潜。在复刊后，两次在《舆论导报》上发表文章强烈抨击程潜，力主唐生智主持湘政。这对当时程、唐合作共同走向和平是极为不利的。经黄栋向周弼襄做工作，才解决了这一问题。黄栋后来被任命《舆论导报》编委，加强了《舆论导报》的力量。

其三是，唐莽（桂良）与程潜的宿嫌已久，程潜在1948年回到湖南后，省会各界于7月24日为程潜举行了欢迎大会。程在欢迎会上曾说：“我今年六十有九，但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拚命，纵然到一百岁，我也有勇气与‘共匪’拚命……。”唐不理解程潜的非由衷之言，因而不满，打算以民革名义组织湘西一部分武装力量来改变湖南局势，并联络了当时湖南大学教授孙伟东与之合作，许以省建设厅厅长职务。消息传出后，黄栋向中共地下党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此举不利湖南人民团结自救，必须设法劝解，经唐伯球、曹伯闻等做工作，得以消弭。

实际上，程潜在1948年7月24日省会各界欢迎大会上的发言，是故作警人之辞的，连省保安司令肖作霖也不知内情，大为恼火，曾在会后向程潜说：“颂公今天的讲话影响很不好。”程回答说：“你要知道，南京也在听我讲话。”这就说明是故作姿态，意在蒙蔽国民党当局。

黄栋曾为此事去“湖大”，利用私人关系，在湖大组织了一些教授成立读书会，宣传中共的方政策和指出湖南的出路，并到唐莽家交谈，分析形势，认为湖南的出路只有团结御侮，舍此无他，唐莽同意了黄栋的看法。一场内部纠纷，在共产党人的调解、引导和帮助下，及时地得以圆满解决，并把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八、掩护周礼同志

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后，书记周礼先住在韶山一个乡村小

学，由这个学校的教师——他的战友和伴侣常杏云掩护。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省工委的指挥中心转入长沙市。这样，革命的据点和周礼的住所就在民革地下成员社会名流曹伯闻的掩护下，设在湖南省孤儿院（曹伯闻兼任院长）。周礼在这里开展了地下革命工作。孤儿院成为湖南人民和平解放事业的指挥基地。

曹伯闻早在1932年就曾资助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主办的《现象》、《新地》等刊物，营救过共产党人，掩护过革命的同志，资助中共党员从事革命活动。曹伯闻1971年12月13日逝世后，不少党和政府领导人深表哀悼。周礼来长沙后，先由曹伯闻掩护，后因曹伯闻受地方恶势力柳森严等人的排挤，辞掉了孤儿院院长职务，因而周礼转到龙伯坚处。

1949年5月，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派组训专员陈瑞衡，大队附马干臣到“湖南省会交通事业工会联谊会”（简称“交联”），找民革地下成员交联首席代表周荣光，想从周的口中刺探中共长沙市工委交通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他们问周荣光是否认识傅作宾，并查询交联人员的情况。周荣光回答说：“我是交联的总负责人，交联的成立和它所进行的工作都是经过省社会处批准的，情况省社会处十分清楚。我就住在这里，随时都‘欢迎’来找我。傅作宾仅仅是认识而已。”因为时近中午，他们在临走时约周荣光第二天去伯陵路（现蔡锷路）中国农民银行二楼谈话。周荣光即将这一情况向傅作宾和周翊襄作了汇报。傅作宾是中共地下党员，交联的总支书记，又是交联的秘书长。交联是中共交通党总支组建的。通过民革组织及其成员活动，掩护了中共党组织和中共党员。

九、发动群众 争和平 反迫害

民革地下工委为了使其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人士易于

接受真理，认清形势，辨明是非，印发了民革中央颁布的《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国民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同时，由黄栋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取来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它的实际内容是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城市工作政策》等文件，组织民革地下成员和一部分有联系的社会人士学习讨论，收到了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的显著效果。

在对外宣传发动上，当时民革掌握的有《舆论导报》（周翊襄、黄栋主办）、《双周评论》（李茂秋主办）、《长江日报》（廖文岛、钱去非主办）。另外，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和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国民日报》，都有民革的地下成员。如《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国民日报》总编辑梁士洁等，他们都能抓住机会，见隙就补，含蓄地报道新华社的一些消息，大胆地报道湖南和平自救运动，发表评论、通讯，大造和平声势。1949年6月，在和平自救的影响下，成立了“长沙市新闻界自救委员会”，由梁士洁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对和平自救的宣传，逐步有了比较统一的步调。

白崇禧为了对抗和平自救运动，成立了一个所谓“湖南省戡乱建国委员会”，以“聘请”形式硬性指定一些社会名流为“委员”，以华中“剿总”新闻处的名义，强迫长沙各报发表“委员”名单，行招摇撞骗之术。周南女中校长周昭怡被指定为“委员”后，极为愤恼，抵制吗？慑于白的权势，不能公开反对，乃求商于梁士洁。梁出点子，以“校务繁重，无暇兼顾”为由，不能担任“戡乱”委员，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周昭怡启事，这则启事一见报不少人纷纷仿效，几家大报都登满了这样的启事，白崇禧也无可奈何。

1949年5月左右，白崇禧无故逮捕了段梦晖，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各民主党派地下组织召开了声援大会，决定全